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為綜合性的學術文化刊物，旨在促進海內外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交流，為中國文化的長遠發展而努力，無論是人文抑或社科類的學術研究成果都非常歡迎，期待各界專家學者在新一年惠賜佳作。

——編者

## 工廠外的勞動力流動與政體隱喻

朱江華峰〈工廠外的「討價還價」：中國製造業中介招工市場初探〉（《二十一世紀》2024年10月號）一文通過給勞動力中介細算經濟賬的方法，呈現出製造業工人高流動性背後的多重權力博弈。該文回應的關鍵問題是：在全球化生產體系和靈活僱傭制度之下，流動的工人何以被穩定地控制。換言之，資方及其中介代理如何應對勞動力流動的不確定性問題並不斷加劇勞動力的商品化程度。

正如社會學家史密斯(Chris Smith)所言，勞資博弈圍繞勞動力的雙重不確定性——勞動力流動與勞動過程展開，兩者之間有着密切關聯。工廠外關

於勞動力流動的討價還價邏輯，並不同於勞動過程中勞資雙方關於努力和報酬的討價還價邏輯，卻又加劇了後者的複雜程度。從文中深描的招工市場定價過程可以看出，勞務公司等中介代理通過轉換定價模式、控制薪酬結算時間等多種策略，操縱着工人的流失率以獲取盈利空間，形構成勞動力流動的常態化、穩定化。這一過程雖能讓少數個體勞動者獲得短期利益，卻不利於整體勞動者處境的改善。究其原因，工人是被資方委託的中介代理這一「外在力量」所組織化，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人內部力量卻變得更加支離破碎。當中介與資方出現利益不一致時，中介會巧妙地撬動工人的力量與資方相抗衡，通過工人的流動性影響勞資博弈。當中介與資方利益一致時，中介則暴露出資方代理者的本性，透過操控定價機制，加劇工人的弱勢地位和不利處境。

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工人的集體力量被中介所利用，轉化成為中介的利潤來源和資本積累手段。在利益的驅使下，市場化的勞務中介沒有動力承擔社會職能。因此，勞動力的定價這一表面「純粹」的

經濟行為，背後卻可能正是集體談判力量被懸置和「冒用」的結果。總之，工廠外由中介代理主導的討價還價邏輯，其背後體現出的政體隱喻是：鬥爭不僅發生在工廠內部，也發生在工廠外部（包括中介機構的不同層級和不同部分之間，工人與中介之間，中介與資方之間），後者進而影響前者。

此外，該文將無形的定價過程有形化，這一研究思路富有啟發。勞動力市場中原本抽象的價格要素，通過中介代理的社會過程得以具象化。由此，風險轉移的過程變得具象化，即彈性生產和代理經營的雙重風險被進一步轉移至勞動者身上，被市場的「自然」運作所掩蓋的生產政治問題也得以彰顯。就研究方法而言，該文的田野資料極其豐富、詳實，論證過程十分精彩，讓我在閱讀學習的過程中受益匪淺。

毛麗丹 北京

2024.10.14

## 「新鄉紳」與「黨治」——蘇北豐縣的故事

張雷〈孤獨的革命：民國蘇北豐縣的黨治（1927-1938）〉（《二十一世紀》2024年10月號）一文依據新見或已刊地方史料，描述了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地方故事：1927至1938年間，國民黨豐縣黨部在不同地方精英間縱橫捭闔，逐漸在與舊鄉紳的博弈中佔據優勢，在當地構建出「黨強政弱」的政治格局，最終卻因其強勢踐行激進

的革命理念，陷入內外交困的處境，反為中共地下黨滲透提供了契機。傳統看法認為，北伐後國民政府實行「以黨治國」的訓政——中央「以黨統政」，地方黨政分開——這一政治安排顯然未能實現真正的「黨治」，有學者將其概括為「弱勢獨裁」。

正因如此，張文的創見在於，以強勢「黨治」的豐縣故事為例，嘗試挑戰國民黨在地方層級「黨弱政強」這一經典結論。但應注意的是，張文把接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稱為「南黨」，這與1930年代國民政府在鄉村培育的「新鄉紳」的意涵高度一致。他們的「新」在於兩點：一是受過中等程度以上新式教育的本籍知識份子；二是其權力並非來自地方社會支持，而是來自國家權力授權。因為在縣以下的區一級，國民政府規定區長由上級「訓練」和「甄用」。正如著名學者黃宗智指出，此舉意義深遠，徹底改變了「國權不下縣」的地方自治傳統。1935年江蘇對全省449名區長的統計表明，區長平均年齡在三十至四十歲，除二十九人未取得新式教育學歷外，其餘均有留學、大學、專門學校、師範、中學等學歷。從經歷來看，教師、黨部出身者佔到總數的二三位數。據1936年江蘇省的保甲報告，亦能發現江蘇的鄉鎮保甲長以三十至四十歲的壯年為主，六十歲以上的耆老屬最少數。他們雖仍以受私塾教育者居多，但受中小學教育者亦佔據將近半數。故有研究認為，江

蘇已完成新舊鄉紳的新陳代謝。在蘇北地區尤其如此，中共蘇皖邊區黨委在一份報告中便指當地是「國民黨的模範區，有深厚的基礎」。

由此可見，「南黨」群體不限於縣黨部的若干主事者，還包括大量區鄉鎮保甲基層幹部。而從文中來看，作為政敵的「北黨」舊鄉紳只是通過一次暗殺以及縣黨部一名「南黨」委員轉投中共，就令整個豐縣的「黨治」土崩瓦解，轉變如此突兀令人訝異，作者無疑需要更多證據去釐清其中細節。

陳力 杭州

2024.11.3

## 產權關係和傳統行業生態的社會主義改造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重要分水嶺，此方面的既有研究多集中於產權關係的變革，而忽視了社會主義改造對傳統行業生態巨大且深遠的影響。徐斌、邊璟的〈建國初期湖北省水產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二十一世紀》2024年10月號）一文，為學界填補了這一空白，將社會主義改造研究引向深入。

作者通過對湖北省水產業的深入剖析，不僅呈現了水產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貌，還揭示了改造過程中的內在邏輯、實施策略，以及遭遇的困難。政府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的。首先，需要建立全新的國營體系來取代傳統的魚市，這不僅涉及到經濟運作的模式轉變，還牽扯到從業者的生計和社會地位的轉換。其次，需要處理

與漁民的關係，這要求政府在經濟上進行引導和管理，在社會上進行有效的動員和整合。

文章中提到的政府目標和管理策略，顯示出政府在推動社會主義改造時的宏觀視野和細緻規劃：通過建立漁民產銷合作社、水產市場、水產管理站、醃魚加工廠與水產供銷公司等一系列機構，試圖構建起一個全新的水產業管理體系。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的市場運作模式，通過國家的力量來引導和規範市場，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行業的有序發展。然而，改造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水產市場與管理者的變革，以及管理費問題，都反映出在實際操作中的困難。這些問題不僅涉及到經濟層面的矛盾，還引發了社會層面的不滿和抵觸。

文章通過對湖北水產業改造的個案分析，得出了社會主義改造是產權關係和傳統行業生態雙重變革的結論。這一點對於理解社會主義改造的複雜性和多維性具有重要意義。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制度的更迭，更是一種社會結構和文化生態的轉型。傳統市場的存在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漁業社會中溫情脈脈的一面，但中共對於國家力量不斷削弱的歷史後果有清醒的認識，彼時的中國只能依靠「科層式」管理來實現中國經濟體系的獨立自主與現代化，即針對流通領域進行國家管理。這一認識不但對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對當前中國新經濟模式的構建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潘威 昆明

2024.11.4